

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

音乐上海学丛书  
*Shanghai Music Study Series*

丛书主编 洛秦

沪剧：现代上海的传统戏曲



[英]施祥生 著 赵 玥 译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CONSERVATORY OF MUSIC PRESS

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建设计划项目资助 项目编号: e05011  
上海市高峰高原学科建设项目

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

音乐上海学丛书

*Shanghai Music Study Series*

丛书主编 洛秦

# 沪剧：现代上海的传统戏曲



[英]施祥生 著  
赵 玥 译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CONSERVATORY OF MUSIC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沪剧：现代上海的传统戏曲 / (英) 施祥生著；赵  
玥译. —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7. 6  
ISBN 978 - 7 - 5566 - 0217 - 9

I. ①沪… II. ①施… ②赵… III. ①沪剧—研究  
IV. ①J825. 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23534 号

丛 书 名 音乐上海学丛书  
主 编 洛 秦

书 名 沪剧：现代上海的传统戏曲  
著 者 [英] 施祥生  
译 者 赵 玥  
责任编辑 杨成秀 范进德 章文怡  
封面设计 梁业礼  
出版发行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汾阳路 20 号  
印 刷 上海肖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6.75  
字 数 244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566 - 0217 - 9/J. 1179  
定 价 68.00 元  
出 品 人 洛 秦

# 序言：“音乐上海学”的意义

洛 秦

## 一、“音乐上海学”的概念

如同上海是中国的上海，也更是世界的上海一样。上海的音乐完全不仅只是区域音乐的内容和范畴上的意义。

20 世纪上半叶，音乐在上海这座被誉为“东方巴黎”的国际大都市中扮演的角色，不仅弹弦吹管琴箫和江南丝竹，吟腔演唱越剧、昆曲和新皮黄的海派京剧——音乐的民族传统在这里生根发芽并茁壮成长，而且几乎与当时国际舞台同步，演绎着各类欧洲著名古典作品，交响乐、歌剧、室内乐、芭蕾舞剧及各类形式的音乐会数不胜数——一派国际大都市的音乐生活景象，其中还穿插着纽约爵士、结合着中国风格的时代曲在各种舞厅中回响。

然而，这并不是音乐上海的全部，更重要的是，在音乐中目睹和诠释了中国和世界历史与社会的重大变迁，诸如上海租界中“音乐飞地”的帝国梦想；犹太和俄罗斯音乐家旅居上海所折射出的“二战”阴影和“十月革命”风暴；蔡元培和萧友梅创办的国立音乐院标志着中国第一所高等音乐学府的成立；黄自、谭小麟培养了一批如贺绿汀等中国作曲家预示着中国音乐创作现代性意识的确立；聂耳、任光等组成的“左翼”音乐小组高举反帝爱国大旗，以及大规

模的唱片广播业、舞厅文化、音乐教学课程体系化中体现的音乐工业、娱乐和教育等西方工业社会方式对中国传统的巨大冲击和影响，等等。正如笔者曾以“1927年”为关注点撰文《音乐1927年叙事》<sup>①</sup>，讲述了国立音乐院建立过程中所涉及的人、社会和国家大事。如今的“音乐上海”也是如此，同样展演现代上海乃至中国的重大主题，诸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古琴、昆剧所表现的传统价值与现代文明之间的矛盾；“韩国音乐飞地”所面临的多元文化融入与冲突；沪剧、丝竹及民俗音乐传统在现代城市化生活中的变迁等，这些音乐现象都表现了中国乃至世界现代社会的共同问题。

音乐上海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音乐上海是艺术的，也更是人文及社会和政治的。

因此，笔者曾撰文《“音乐上海学”建构的理论、方法及其意义》<sup>②</sup>所倡导的“音乐上海学”概念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和现实基础，以此来探讨其作为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进行关注和深入研究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笔者曾强调，“音乐上海学”是一个基于“地方性知识”的城市音乐研究论域。虽然研究的主体是“音乐”，研究对象无疑是上海的音乐，作为一个专门的学术研究领域，具有突出的学科意识架构、研究内容和范畴，其包括上海音乐的各个方面，即音乐家、音乐作品、乐队社团、学校机构、活动事件，以及乐论思想等涉及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问题，但这些都是分门别类的研究内容，它们的深入、汇集和综合并不等于“音乐上海学”。因此，“音乐上海学”在研究定位、视角、范畴和方法等方面的学术思考是多元交叉的。需要明确的是，此处所谓的“学”即“研究”，并非“学科”(-ology)的含义，只是“研究”(studies)的含义，类似于“敦煌学”“莎学”或“红学”，由于《红楼梦》《莎士比亚戏剧》和敦煌莫高窟所蕴含内容之丰富、研究价值之珍贵、成果积累之丰

---

① 洛秦：《音乐1927年叙事——国立音乐院诞生中的历史、社会及其人》，载《音乐艺术》，2013年第1期。

② 洛秦：《“音乐上海学”建构的理论、方法及其意义》，载《音乐艺术》，2012年第1期。

厚以及涉及问题之庞杂而成为专门之“学”。<sup>①</sup>

就城市音乐现象而言,世界上再也不可能找到一个像上海具有这样复杂性的城市。世界上几大城市,纽约、东京、巴黎、伦敦等,他们都是国际大都市,音乐内容很丰富,也各具特色。然而,我们从《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条目中列举的有关上述音乐城市的内容来看,从音乐内容的丰富性、复杂性、多元化方面考察,它们与上海相比都相去甚远。简单地说,西方大城市所具有的各类音乐活动上海都有,而上海具有的“地方性知识”的内容和特点,是世界上任何大城市都不具有的。因为它具有所有大城市的现代性功能,同时其还带有以往政治、经济中心以及租界文化的痕迹,也是一个吴越传统的集散地,而且脱离不了的意识形态影响更是增加了它的多元色彩。对于这样一个复杂体,“音乐上海”以至于成为专门的学问——“音乐上海学”,应该是当之无愧的。

我曾经作过以下表述:这个概念的特殊之处在于上海这个城市的各类音乐事项的特殊历史形成、内涵的多层次社会文化结构,以及周边甚至世界范围内的辐射力,并且由于其所处的大的社会历史背景的共性,使得“音乐上海学”这一“地方性知识”能够以某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国城市音乐发展的“缩影”。上海市区同周边郊县农村、以上海为中心的多座城市构成的城市带、国家乃至世界对上海的影响及文化互动,属于这些不同层次范围的音乐文化事项当然都在“音乐上海学”的关注之中。所以,不同城市的研究根据其具体情况都会有不同的定位,对其他城市的音乐文化现象的研究同样是有其不可取代的价值的。

上海这座“音乐富矿”之城,从其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向现代性或现代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而言,“音乐上海学”又体现了对于地方性知识的超越。<sup>②</sup>与上海城市的发展及其特殊性相辅相成,上海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的“摇

<sup>①</sup> 洛秦:《城市音乐研究的语境、内容与视角及“中国经验”的方法论思考》,载《中国音乐学》,2017年第2期。

<sup>②</sup> 洛秦、胡斌、王永健:《中国艺术人类学前沿话题三人谈:城市中的艺术田野与“音乐上海学”》,载《民族艺术》,2015年第4期,以及王永健、洛秦:《城市音乐人类学研究——洛秦教授访谈》,载《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15年第5期。

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上海，就没有今天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没有上海，也就没有中国音乐的现代性转型及其眼下音乐文化的大繁荣；没有上海，中国音乐更不会有如今在国际乐坛上的地位和影响。

因此，正如前文所述，音乐上海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音乐上海学”概念的价值正是如此。

## 二、“音乐上海学丛书”的内容

笔者主持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 E-研究院建设工作十余年，在此期间，其中最重要的项目就是“音乐上海学”的研究。除了本人完成的两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城市音乐文化论：20 世纪上海城市音乐文化研究》和《上海城市“飞地”移民音乐研究》，指导硕博研究生进行了一系列课题研究约五十项<sup>①</sup>，同时策划、组织和主编一套“音乐上海学丛书”<sup>②</sup>。

“音乐上海学丛书”是一个开放的系列，随着研究不断深入，丛书的内容和数量将不断增加。本次出版的“音乐上海学丛书”共有 20 种，简介如下：

1. 洛秦《海上回音叙事》。该书的研究以相关的文章及珍贵的图片，特别是 12 集音乐电视纪录片系列《海上回音》的珍贵 DVD 视频资料，多侧面且生动形象地记载了上海近代的音乐文化历史。图书通过一段特定的历史（1843—1949）和一个特定的地域（上海）与音乐相关的文化记忆，试图建构起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化认知和情感表达。内容涉及江南丝竹、古琴雅集、外籍音乐家在上海、歌剧、乐队、爵士音乐、流行音乐、钢琴、小提琴、音乐剧场、中国第一所高等音乐学府——国立音乐院等相关内容的叙述，并且附录三篇关于上海近代音乐研究的学术论文。多方面介绍了近代上海的音乐文化面貌

---

<sup>①</sup> 这些研究涉及了众多方面的论题，诸如：1) 传统音乐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变迁，2) 音乐媒体与大众音乐研究，3) 音乐产业与消费研究，4) 音乐教育与传播方式及其作用研究，5) 音乐场所的社会功能，6) 城市“飞地”音乐现象研究，7) 地方传统城市化中的社会性别研究，8) 社会学与亚文化类角度的研究等，这批成果也正在出版中。

<sup>②</sup> 其中有部分著作曾列入已经出版的“上海城市音乐历史文化研究丛书”之中，现一并归入“音乐上海学丛书”。

和特色。

2. 汪之成《俄侨音乐家在上海 1920s~1940s》。该书以 20 世纪 20 年代至 40 年代旅沪俄侨的音乐生活为主要研究对象,从俄侨文艺团体中的音乐活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乐队、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俄侨专业音乐学校与私立音乐教育、大器晚成的俄国器乐艺术、访沪演出的俄侨音乐家、器乐家、俄国合唱艺术、歌剧艺术、旅沪俄侨歌唱家和歌剧演员、俄国古典芭蕾舞和通俗歌舞、旅沪俄侨舞蹈家等 12 个方面,对该时间段旅沪俄侨的音乐活动进行了概览式的梳理工作,资料翔实丰厚。

3. 韦慈朋《江南丝竹音乐在上海》。该书以江南丝竹作为研究对象,从多角度多层面介绍了江南丝竹的音乐传统。通过访谈、对话和观察参与上海江南丝竹社团活动的方式,以及对现场录音和参与观察的表演进行的音乐分析,作者既分析了江南丝竹音乐的多个层面(乐器、曲目、曲式、变奏、织体、审美)、生存环境和与之相关的思想体系,也探讨了专业演奏者、业余演奏者和中西方音乐理论家所持的看法与价值观。

4. 施祥生《沪剧:现代上海的传统戏曲》。该书将沪剧作为城市民族音乐学的一个研究个案,著作以历史为轴,按照年代贯穿,并且提出不同年代的主要关注点。第一章、第三章从历史角度阐释问题,以历史为定位,运用了现存的原始及二手素材,评估沪剧在上海的产生、改变等问题,并针对 20 世纪中期上海沪剧的发展形态,延伸对剧种历史的思考。第二章、第四章通过特定时期的实施例证,思考社会问题,关注女性表演者在沪剧发展史上的重要影响,涉及音乐与性别的讨论,以及音乐如何刻录社会变革,即 1949 年以来沪剧的戏曲改良、与社会政治的关系等问题。最后,通过个案研究,从方法论上对学科理论进行反思。

5. 汤亚汀《上海犹太社区的音乐生活(1939~1949,1998~2005)》。该书运用音乐人类学-文化研究的整体理论模式,描述犹太人在上海近百年的移民音乐文化史,聚焦于二战前后中欧——来自德奥和波兰等国的犹太社群(此即狭义的“上海犹太社区”)在上海的音乐文化。但追溯到南宋末年的开封中国犹太人以及百年前来沪的哈尔滨犹太人和上海早期的巴格达犹太人

与俄罗斯犹太人，研究其音乐文化同二战期间上海犹太人音乐文化的关系，涉及其音乐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对上海音乐生活的贡献。最后考察了上海新犹太社区的音乐生活。

6. 齐琨《历史地阐释：上海南汇丝竹乐清音的传承与变迁研究》。该书选择江南富庶乡村社区的传统丝竹音乐为研究对象，探讨在中国近百年（1850—2004）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南汇清音这一传统乐种以何种音乐文化内应机制，既适应了不断变迁的社会环境，又延续了音乐文化传统。著作按照时间顺序，对清音在南汇一百多年的承传历史加以阐述；同时关注清音曲目增减、乐器组合形式和演奏技法中的加花变奏等内容，有重点地反映清音音乐本体中的承传因素；并记录了不同时期的婚丧礼俗仪式和政治、政策宣传活动，体现清音音乐行为的社会意义。最后对上述音乐文化现象进行分析，阐释传统音乐的传承和变迁过程中音乐文化的内应机制。

7. 孙继南《黎锦晖与黎派音乐》。该书旨在通过已掌握的可靠史料、史实，对黎锦晖其人、其作加以评述，具体包括：人生道路、音乐道路、历史评价三个部分。其中，音乐创作涉及“儿童歌曲”“时代曲”“爱国救亡歌曲”三个方面。在人物评价部分，对黎锦晖在音乐史上的贡献作出了正面积极的评价，冀盼有助于读者对历史上“黎锦晖现象”的进一步思考，认识其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过程中应有的地位与作用。

8. 汤亚汀《帝国飞散变奏曲：上海工部局乐队史（1879—1949）》。该书以城市社会学/文化研究/音乐人类学跨学科的方法，以移民史的角度，尤其是“帝国流散”的角度，反思上海 1870 年代至 1940 年代，工部局乐队作为一种外国流散群体的跨国音乐文化机构，在上海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变迁，对工部局乐队历史进行描述与阐释。图书将工部局乐队的历史划分为：1. 工部局乐队时期，包括公共乐队时期、管弦乐队初期、鼎盛时代、衰退时代；2. 后工部局时期，包括上海交响乐团时期、上海市政府交响乐团时期。研究资料主要来自上海档案馆的相关资料、演出节目单、新闻报道和部分乐评。

9. 李岩《情深至吻：上海中华口琴会及其推广的音乐》。该书采用民族音乐学的视角，论述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口琴音乐在上海城市中的发展史，及

其与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联系,并通过个案——上海中华口琴会在发展中形成的音乐文化和操作模式,及其对中国各界影响的分析,在历史材料及现实中依然健在的历史当事人对历史的回忆两类资料基础上,将中国口琴音乐的历史源头、流传经过、演变过程及中国口琴音乐发展史予以钩沉,并对王庆勋的个人历史作用重点予以阐述。

10. 王艳莉《上海工部局乐队研究》。该书将“工部局乐队”作为研究对象,将其放在中国特定的社会与文化环境中来考察,通过对工部局乐队历史的追述,探寻其与中国社会交往的历史轨迹,并对其在中国近代音乐史上的影响进行客观的总结与评价。研究中特别关注并深入探讨生存于中国社会的这个“西方管弦乐队”是如何影响中国人,而中国人又是如何接纳对方的。主要从工部局乐队的早期历史沿革、乐队的职业化历程、乐队辉煌时代的艺术成就、乐队的经营状态以及乐队与中国近代音乐的紧密联系等几个方面对工部局乐队进行专题研究,以期更为全面、系统地掌握工部局乐队的历史全貌。

11. 陈晶《上海基督教会学校女子音乐教育研究》。该书以上海三所基督教会学校:两所中学——中西女塾、圣玛利亚女校,一所大学——沪江大学为切入点,旨在通过对这三所学校音乐教育模式的探究,以厘清其女子音乐教育的发展历程与发展规律。这三所基督教会学校女子音乐教育的历史跨越了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50年代初的时间维度,“中西女塾与‘世俗女性人才’音乐教育”,阐释了以培养中西兼通、影响于社会的“世俗女性人才”为主旨的中西女塾的音乐教育活动;“圣玛利亚女校与‘女基督徒’音乐教育”,阐述了以“培养合格的女基督徒”为建校旨趣的圣玛利亚女校的音乐教育活动;“男女同校制度下的沪江大学女子音乐教育”,阐明了男女同校的沪江大学中的女子音乐教育和音乐生活状况。这段历史反映出在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和变革时期中,基督教会学校女子音乐教育观念、体系的嬗变轨迹,映照出中国近现代女子音乐教育在上海的发展历程。

12. 黄婉《凝聚族群的“飞地”音乐生活——以上海的韩国离散族群为个案》。自从1992年8月24日中韩建交以来,特别是1998年全球金融危机

后,上海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韩国人。韩国人聚居在虹桥镇,形成了被上海人称为“韩人村”的韩国社区。该书以此拥有近二十年移居历史(1992—2009)的上海韩国跨境“离散”族群为考察和研究对象,通过历时三年的“参与观察”的田野作业方式,考察了位于该“韩人村”里的四万名韩国人的“飞地”音乐生活。作者通过历史概述(1919—1945)和对当下(1992—2009)上海韩国“飞地”音乐生活的叙述,分析韩国“飞地”音乐生活中传统音乐异常繁荣的特殊现象,提出中心问题,进而阐释上海韩国人如何通过传统音乐生活来应对文化差异和歧视,因此维持了传统的族群音乐认同内涵与形式,以及揭示出上海韩国人如何通过传统音乐生活来应对社会结构性不适和经济利益冲突所带来的社会适应冲突,因此维持和构筑了新的族群音乐认同,从而认为,韩国传统音乐在海外“飞地”被赋予了凝聚族群的意义。

13. 胡斌《文化认同与现代表征:百年上海古琴文化变迁》。该书以近一百年来上海古琴文化变迁为个案,通过相关史料的梳理以及对当下上海古琴在各个领域发展过程的田野调查,试图从文化认同与文化表征的理论视角对这一个案进行分析,并提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著作对文化认同理论及有关的琴学研究进行了梳理,并对以认同理论进行琴学研究的必要性进行了说明;从文化地理、历史积淀、社会环境等方面对个案所在文化场域进行了全面分析,同时对以上海古琴文化变迁作为田野个案的典型性和有效性进行了论证;对上海琴人群体在不同时期的文化身份、社会角色以及对古琴文化的多元认同等内容加以分析,并对琴人的角色分化与认同危机进行了反思;对上海古琴文化在不同时期的多元化音乐创作历程以及在琴谱、音量、形制等方面的变革进行了梳理,指出各种类型的古琴音乐艺术实践实际上反映出了琴人群体在认同观念上的变化以及对社会各种强势话语的呼应;从大众文化、公共文化以及“全球化”视角来探讨近年来在上海古琴文化实践中所表现出的种种机遇与矛盾,力图揭示古琴文化被当代多种阐释话语所改造、重组的复杂过程。在结论中还探讨了以该个案研究反观整个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14. 吴艳《从“门图”到“搭班”:上海民俗音乐传统的变迁研究》。传统民

俗和民俗音乐仍然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对生活在上海这个现代化大都市中的一部分民众的社会生活产生着重要作用。这种现象无疑是音乐人类学(尤其是城市音乐人类学)值得调查和研究的重要课题。该著作是对上海民俗音乐传统在当代如何发生变迁的研究,其以多个案、宽视野的田野考察资料为基础,结合大量地方文献资料,运用音乐人类学方法,以上海民俗音乐艺人班社的组织方式为切入点,考察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社会环境中,民俗艺人如何调整生存机制以适应变迁的过程。作者对旧时上海民俗音乐班社“门图”制和当下上海民俗音乐艺人“搭班”制,分别加以追溯、描述和解析,其中包括对“门图”“六色人”特征的解释和对乐班在行艺范围、用乐规定等方面如何遵守民俗规约的阐述,对如何“搭班”,用何种音乐,怎样适应新时代、城市化而调适其生存机制等问题的分析研究。在此基础上,进而把握上海民俗音乐形态的历史演变的脉络,阐述了从“门图”到“搭班”这一乐班习规变化的过程及对音乐的影响,并尝试对“门图”制如何转化为“搭班”制的原因加以阐释,从中探究了民俗音乐文化如何以及为何从“过去”转化到“现在”的原因。

该书作者借鉴笔者提出的“音乐人事与文化研究”模式,解读上海民俗“音乐人事”是由怎样的特定机制支撑和促成的,特定机制又是在受到什么样的历史场域作用下的音乐社会环境中产生的,以试图多层次地阐释民俗音乐的“传统”与“现代”如何得以承接和怎样产生变异的关系。并对如何认识“民俗音乐传统”以及如何看待上海城市中的民俗音乐传统作进一步理论思考和观点阐释。

15. 潘妍娜《“回归传统”的理念与实践——上海昆剧团全本〈长生殿〉研究》。2007年在上海兰心大戏院上演了上海昆剧团的全本《长生殿》,这是昆剧经典《长生殿》300年来首次以“全本演出”的方式重现舞台。上海昆剧团和制作人唐斯复将原著整理为四本《钗盒情定》《霓裳羽衣》《马嵬惊变》《月宫重圆》,分四个晚上演出。这出戏在音乐实践上一反上海昆剧团之前“创新型”剧目常用的对于唱腔和音乐的改革手法,而以“重现唱腔原貌”为原则,以大齐奏为主的方式伴奏。作者从上述活动入手展开田野考察,同时对四本

《长生殿》进行文本分析,进而从笔者提出的“音乐人事与文化研究模式”的思考角度对该事件展开分析,认为: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上海逐渐成为一个全球化都市,在此历史场域下政府到社会滋生了一种对于“传统”的需求。同时在上海特殊的城市环境之下,一个希望获得振兴的剧团,一个希望重塑城市\文化形象的政府\国家,一批希望重塑文化身份、回归传统生活的新兴受众群体构成了支撑四本《长生殿》产生的音乐社会。在此需求前提下,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申办成功为昆剧带来的机遇,“不新不旧”的创作观念、多元混杂的艺术实践和关键人物唐斯复是四本《长生殿》获得成功的特定机制。对于四本《长生殿》“不新不旧”的创作观念,多元混杂的艺术实践所塑造的“传统昆剧”形象,作者同时借用赖斯“挪用传统”和霍布斯鲍姆“发明的传统”的理论,将其阐述为全球化与现代化背景下,现代人对于昆剧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原真性”想象与需要。

16. 张延莉《评弹流派的历史与变迁——流派机制的上海叙事》。该书以评弹流派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晚清以来有关评弹的大量历史资料的梳理和作者数年的田野考察,对评弹流派兴盛的两个黄金期(20世纪二三十年代和20世纪50年代)与当今流派发展展开历时比较分析,通过使用“流派机制”这一分析工具,通过对各个构成要素的比较,关注了评弹流派的历史与变迁。从而认为,其一,当今评弹没有新流派产生的原因是整个流派机制的缺失,失去流派生成、发展的生态环境;其二,原有流派在当今社会所发生的变迁从而导致流派意义和功能转化,朝着舞台化、艺术化方向发展,并产生上海、苏州的地域性差别。著作探讨了评弹流派机制问题,并尝试对评弹流派在上海的生存现状及其文化意义进行历史的、田野的叙事。作者坚持“整体观”和“生态观”,将文化现象放置于动态发展的历史语境与生态系统中,使用历史叙事和现实叙事相结合的叙述方式,试图探讨评弹流派在上海的历史与变迁及其背后的文化意义。

17. 宫宏宇《海上乐事:上海开埠后西洋乐人、乐事考(1843—1910)》。该书拟就目前所见的相关中西文文献及中外研究成果来探讨上海1843年开埠后寓沪西侨及来华西人间的音乐活动,所涵盖的时段为19世纪中期至20

世纪初期。在组织结构上,著作大致以时间为序,分九章依次讨论以下几个话题:1)上海开埠后教会音乐活动;2)早期外侨社团演剧活动中的音乐;3)寓沪外侨业余乐人、音乐组织及其演出活动;4)来上海造访的各国军舰及当地驻军的音乐活动;5)旅居上海的外侨专业乐人;6)“贝多芬”在上海;7)外来专业音乐家在上海举办的音乐会;8)外来演出团体、歌剧团;9)寓沪西人与中国音乐研究。鉴于上海工部局乐队近期已有多部专著和博士论文,书中除讨论前人所未涉及的细节外,将不重述其成立过程。

18. 肖阳《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乐专科学校音乐教育制度研究(1927—1937)》。著作聚焦于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专的音乐教育制度,以1927—1937年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专的初创十年为研究时限,以上海音乐学院历史档案及民国相关文献史料为基础,从“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专音乐教育制度生成的社会历史环境”“教育制度保障”“人才培养制度”“音乐教育制度下的办学理念及办学成果”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论证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专在1927—1937年间,逐步构建的一套符合音乐教育发展规律、具有科学合理性、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音乐教育制度,是其办学取得成功并为当时其他音乐学院办学提供借鉴参考的关键;希冀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可为当下上海音乐学院创办国际一流音乐教育以及国家高等音乐教育改革的推进,提供有价值的借鉴与参考。

19. 秦萌《一个音乐群体的社会角色研究——上海交响乐团(1949—2009)》。该书研究上海交响乐团(1949—2009年)音乐家群体的社会角色。从1949年至2009年,60年的社会、历史、政治的剧变中,每一时期演奏家群体社会角色的转变,都与社会政治风向和文艺政策的变化有紧密的联系。作者针对音乐家群体社会身份的转变,试图以大量历史事实来阐述演奏家群体及其所处社会环境和音乐实践诸方面交互影响下社会角色形成的缘由。研究采用社会-历史双向视角,运用音乐社会学方法,从音乐创作与音乐家的社会关系、乐团的历史发展形成与社会变迁因素等方面着手,分层次、多角度地论述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家群体社会角色转变的形成原因;围绕社会角色问题来分析音乐家群体及其相关的各种文化、商业现象和活动,其研究范围包括

社会体制的变化、时代精神、演奏家群体与社会各阶层的关系、谋生的方法，以及音乐创作原则等。研究还试图揭示：演奏家群体如何运用自己的力量和社会权力来改造社会音乐生活。

20. 张鸾《政治制度下的近代上海社团的音乐生活(1927—1937)》。该书作者通过整理《申报》等历史文献，辑录了近代上海社会团体音乐活动的相关史料，了解到近代上海的历史中存在有一批社会团体，它们不以音乐为主要的社会活动，但音乐却成了它们参与社会事务、表达政治立场的一个重要方面。著作描述了近代上海三起社会事件中，社团音乐活动的种类、演员、场地等各个方面，分析音乐活动所处的社会背景、发生的社会环境的根基、涉及的人物之间的关系以及演出剧目的特点和风格等，勾勒社团的音乐及其文化特征。在此基础上，又选择1935年水灾助赈运动中的音乐活动作为个案(事件)，尝试在历史音乐人类学视野下，通过借鉴作者的“音乐人事与文化研究模式”，在历史描述的基础上，探寻支撑和促成该音乐事件的特定机制，阐释事件—机制—语境三者之间的结构性关系，思考1927—1937年间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语境与社会团体音乐活动的互动关系。

从以上这些研究成果的主题和内容可以看到，上海无论在近代，还是现当代，它都是一个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城市。西方音乐最早从这里进入中国，在这个城市里，传统遭遇现代的冲击最为强烈。现代性转型中最直接遇到的冲突就是东西方音乐文化观念、音乐表现形式、音乐传播和接受的方式之间的差异或甚至冲突，文化的冲突和交汇产生复杂的作用。另一方面，近代上海城市文化的殖民性特征，租界在东西方文化碰撞、遭遇中给予了音乐以平台、战场，还是“真空地带”式的庇护地？也许兼而有之？我们对这些问题都进行了思考。特别是，当下全球化概念下的上海，它作为中国的国际经济中心和文化交流中心的地位，更是对城市音乐带来新的影响。我们怎样评价“远东的巴黎”“东方的彼得堡”时期上海城市音乐的样态和价值？往日“国际一流音乐城市”的地位及其形成的因素对如今有什么样的借鉴意义？或许对于殖民文化的产物在所谓“后殖民时代”意识中唤起对以往已经下了结论的观点都在进行必要的重新审视。

20世纪开始,整个中国社会就进入现代转型的无数冲突之中。音乐也同样,尤其是上海,其最早遭遇到现代性的问题。因此,上海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城市,它的音乐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挣扎、协调、选择和发展等都是中国音乐秉承传统走向现代、走向世界需要反思的问题。因此,“音乐上海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城市音乐研究的“中国经验”的典型案例的意义。

### 三、“音乐上海学”所面对的问题及其思考

笔者在《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与经验的反思和发展构想》中曾针对上海音乐论题进行过以下论述,在此引述依然具有现实意义。从学理层面,有几个方面的论题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诸如:

1. 在学理观念上,我们如何借鉴“新史学”的方法,即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融为一体,从而思考小文化与大历史的关系。音乐领域相比上海城市的整个历史,无疑只是其中的很小一部分。然而,怎样通过音乐的小文化来透视整个城市的大历史,来探讨音乐在其中的作用和大历史对小文化的影响,使得我们的研究呈现出一个立体化的、具有活态生命意义的局面。因此,学术观念的进步将成为研究深入的先导。

2. 城市音乐文化研究的基础工作在很大程度上需要良好及相对完整的史料和方志的支持。由于音乐的声音和表演的特殊性,以往很多活动都没有完整记载,即使有一些记录,许多也是只言片语,这也是我们在整理城市音乐志中遇到的困难。也许对于传统史学研究来说,历史记事已经可以比较清楚地说明“事实”的历史存在,可以通过那些历史事实连接起一个音乐发生和发展的线索。这是非常重要的基础。但是,在音乐人类学视野下,城市音乐民族志的写作中,史料中的记载涉及的音乐事件需要解读,需要叙述,需要建构。因此,城市音乐民族志的理念和方法使得我们的研究有很大的挑战性。

3. 目前我们看到的上海音乐文化研究,大多是专题性的个案,它们是上海音乐历史文化大结构中的组成部分。虽然在所有涉及近代中国音乐发展的论述中,上海音乐无疑是重要的内容,也可以说,大多数近现代音乐史论的

20世纪40年代之前的内容很大程度上是上海音乐史,但是,单独以上海音乐为内容的编年史至今尚未出现。目前见到的只有《上海艺术史》中涉及了上海音乐的编年叙述,只有这些内容是很不够的,况且其中的不少史实还需要更正与斟酌。因此,虽然学术研究对于真理的追求是永恒的,也是所有学者须遵守的学术信条和宗旨,但事实上对于我们来说很难有完全的“时机成熟”之际。因此,如果说上海城市音乐文化研究是一个具有丰富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的中国特定历史文化中的区域音乐社会研究,那么它的编年历史的思考和撰写是否应该列入当下研究的议程?!

4. 如果说上海音乐文化史或者称上海城市音乐文化编年史的工作是必需的,那么接下来就需要思考,它将是一种什么学理结构的史论?事实上,目前许多专家撰写的近代音乐史论著中,已经为上海音乐文化史的编撰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无论是人物、作品、社团、表演及乐论思想都有相当完整的史料和论述。在前辈的扎实基础上,怎样才能进一步完善和充实,特别是怎样才能把上海城市或者说上海特定区域的音乐历史和文化凸显出来,怎样把它与整个近代历史关系等能够梳理清楚,这些都将更具挑战性。

5. 目前的研究成果相对都集中在某一领域或专题,不少研究在其研究领域或专题中已经相当深入和翔实,就其研究成果自身来说已经相当完整。当我们从较为宽泛的视野,将个案或专题安置于一个多世纪来的上海城市历史与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之中,就会发现我们将面对一些需要认真思考的冲突、问题和关系: 1) 传统与现代。20世纪开始,整个中国社会就进入现代转型的无数冲突之中。音乐也同样,尤其是上海,其最早遭遇到现代性的问题。因此,上海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城市,它的音乐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挣扎、协调、选择和发展等都是中国音乐秉承传统走向现代、走向世界需要反思的问题。2) 东方与西方。现代性转型中最直接遇到的冲突就是东西方音乐文化观念、音乐表现形式、音乐传播和接受的方式之间的差异甚至冲突,由此我们在大量关于近代音乐思潮的研究中,读到先驱们许多有关的论述。这些研究已经相当成熟和完整,在此基础上,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当时的上海城市对这些东西方音乐文化的冲突和交汇产生怎么样的作用?特别是上海租界给予